



陆小曼《柳荫垂钓图》。

陆小曼画风 清逸雅致

□陈卫卫

风华绝代的民国名媛陆小曼,集美丽容貌与出众才情于一身,她与徐志摩的爱情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陆小曼多才多艺,工诗擅画,艺术大师刘海粟对陆小曼的评价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

陆小曼自幼受母亲的影响而喜爱绘画,少女时代的画作就秀润天成,给人以清新脱俗、飘逸潇洒之感。1926年,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参加了中国女子书画会,徐志摩又让陆小曼拜国画大家贺天健为师,所以陆小曼的画作中有很浓重的贺天健风格。贺天健要陆小曼做到“三看”:一是要细看真山真水,二是要细看古今名画,三是要细看自己的作品。从此陆小曼潜心学画,画艺得到长足的进步。浪漫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又经常外出游玩,一同领略江南的美丽山水,这使她的画作充满清幽深幽的美感。

1931年春,陆小曼画成一幅清丽的山水画长卷后,徐志摩请胡适、杨杏佛、贺天健、梁鼎铭、陈蝶野等名人前来观赏,大学者胡适在赞叹之余挥毫题笔:“小曼作画水大,功力可不小!”名画家陈蝶野题跋道:“今年春予在湖上,三月归,访小曼,出示一卷,居然崇山叠岭,云烟之气缭绕峰峦间,予不知小曼何自得此造诣也。”

陆小曼致力于研究元代倪雲林、明代沈周、清代王鉴等大师的作品,她的画也形成了文人画的风格,赋色清丽雅致,格调脱俗,润泽秀丽。在她的《梅屋图》上,隐士在深山幽谷中欣赏耀目的白梅,诗意盈满,幽趣盎然。整幅画面古朴幽雅、清新悦目。小曼在画上自题有“余生平爱梅成癖,因其骨高不与群花争艳,其味香而清逸。若能筑屋梅间住,定能一洗胸中积闷之气也。”另有画家孙雪泥题句为:“为觅空香绕屋栽,万花留向故园开。诗人合是陶元亮,每到花时始一来。”妙句添彩,可谓恰合画意。

相比别的画作,陆小曼的扇画尤为精致,深受当时名士们的喜爱。在一幅陆小曼于1943年所画的《柳荫垂钓图》中,一只带篷的小船静静地泊在湖上,隐者面对青山悠然垂钓,岸边柳丝垂拂,柔情似水。画面似一幅素雅的绸缎,营造出一种静谧清幽的情趣,意境清远萧疏。用笔轻而松,墨色清淡却无纤尘浮薄之感,以淡墨简笔有神地笼罩住整个画面,可谓天真幽淡。画中那种书卷之气,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这也正是她的作品个人魅力之所在。

陆小曼的画风细腻柔秀,表现了一代才女幽雅淡远的情怀。正如她的挚友赵清阁评说的:“陆小曼的画如其人,清逸雅致,诗意盎然,书卷气洋溢,是文人画的风格——自然洒脱,韵味无穷!小曼说她爱大自然,因此愿陶醉在丹青的河山风景中。”



陆小曼《梅屋图》。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图一)

(图二)

独一无二的西周钩戟

□刘明科

这是一件非常独特的西周早期兵器——钩戟(图一)。之所以说它非常独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相同著录与考古发现的报道。然而,其引人之处还不仅于此,就这么一件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青铜兵器,却躺在异国他乡的法国巴黎集美美术馆的库房里,直至我国台湾学者陈昭容研究员到那里考察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件青铜钩戟!她惊讶道:这不就是只有照片却不见实物、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苦苦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的青铜钩戟吗?于是,这件珍宝的传奇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陕西地方军阀党玉琨在宝鸡盗挖文物的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其盗掘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都已远远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因此,党玉琨也就成了民国时期军阀的三大“盗宝枭雄”之一。最有影响的是1927年秋收至1928年夏收期间,征发民众上万人,在宝鸡东郊戴家湾的大规模盗宝事件,挖出的器物上千件,多是商末周初的青铜重器。这批器物的绝大多数后来经宋哲元之手流失到了国外。但宋哲元离任陕西时,并未将装订成册的这批文物照片带走。它虽然不是戴家湾出土文物的全部,但却成了寻找和研究党玉琨所盗珍宝散落在海外的最有力的证据。这批文物照片共五本,1945年的春天出现在西安的古玩市场。解放后,这批照片资料曾引起了郑振铎、武伯伦、唐兰、陈梦家、王世民等文物考古先贤们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我们

曾对这个重大文物事件进行过调查,并在《中国文物报》上首次正式披露。后来又比较系统地整理出《党玉琨盗掘宝鸡戴家湾文物的调查报告》予以发表。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还无法弄清这批器物包括这件青铜钩戟在内的准确下落。2009年,又有台湾中研院陈昭容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懋懿教授合作,再次对戴家湾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搜集整理。他们先后走访了欧、美、亚、澳的22个博物馆。这件钩戟就是在法国巴黎集美美术馆的库房里发现的,与遗留在国内的文物照片相吻合。得知,这件钩戟最属卢芹斋旧藏,后由巴黎Jacob收藏,现藏法国Saint-Denis博物馆,寄存于法国巴黎集美美术馆。

我们以前的调查中,就发现宝鸡戴家湾出土的许多珍宝的流失与一个叫卢芹斋的古董商有关。经过进一步了解,才发现这个卢芹斋是美籍华人,祖籍浙江湖州,青年时移民法国谋生,后来定居美国,不到20岁的小伙子在短短几年内竟变成国际知名的大古董商。目前存在于海外的我国古董,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之手售出的。可见卢芹斋在戴家湾出土珍宝流失海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虽然这件我国唯一的一件西周珍宝却被外国收藏,确实有点遗憾。但是,其出土流失90年之后,实物能够完全与照片资料吻合,说明这件珍宝还留在世上,起码可以说这件钩戟找到了娘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发现也是一件幸事!近百年的留传经历固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但留在世上总比毁于一旦要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卢芹斋还是让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启

蒙者。正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则报道中所说:“卢芹斋不仅是中国文物的贩卖者,也是教育外国藏家接受真正中国古董的启蒙者,他让欧美收藏家学会了欣赏中国墓葬文物。”他以精湛的文物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

这件钩戟长37.7厘米,宽15.2厘米。尖端分叉,上锋较长,下锋较短,器身有三处镂空,形状均不太规则。背部有左右相反的弯钩形装饰,下有短茎,茎上有长方形穿孔。这种形状的钩戟非常罕见,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曾出土一件亦有类似的钩形装饰(图二),但区别还是很大的。结合这两处墓地的年代,这件钩戟应为西周早期的兵器。此器造型奇特,装饰风格繁缛夸张,鲜有与之相同者。陈昭容研究员认为应该不是实用器,推测为仪仗之用。这是戴家湾墓地出土的最有特点的兵器,为研究其文化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考虑到它与竹园沟出土的青铜戟有相似之处,不排除两者曾受到相同文化之影响。

草原珍宝档案



人形金饰件

□郑承燕

这两件人形金饰件(如图)高9.1厘米,最宽处3.6厘米,重28克。1988年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花根塔拉辽墓出土,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收藏。

1988年8月,阿鲁科尔沁旗牧民朋斯格在花根塔拉嘎查北哈日批冷的沙坨子里发现一批露于沙地的文物,后将这批文物送交旗文物管理所。接到文物后,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派人实地调查,发现并确认了这是一处辽代早期砖室墓葬。由于沙丘发生移动,墓室大部分遭到破坏,只清理出330件文物,两件人形金饰件即为其中之一。

二饰件形象为一男一女,均用金版篆刻而成。男、女呈站立式,双手自然下垂,双脚外撇。二人均留有齐眉发,圆眼、阔鼻、头戴三叉式高冠,冠体饰鱼鳞状纹。上身穿直领左衽窄袖衫,下身着裤,足穿高靴,腰系蹀躞带。服饰上篆刻忍冬、松叶、四瓣团花等图案。其中男性嘴微闭,上唇两侧有“八”字形胡须,女性小嘴微张。两饰件在颈部、双手、双脚部位均有

穿孔,应为缀钉所用。

关于契丹人的服饰,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契丹人皆“髡发左衽”,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对于契丹人的服饰研究,除了文献记载外,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契丹人形象是另一重要参照。而这两件金饰片中二人领口、袖口、衣边等处露有毛边,象征其穿着的服饰可能为皮衣,是契丹人“皮毛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生活的直接反映,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历史、研究价值尤高。

饰件中人物形象的另一特别之处在于三叉形冠。三叉冠在新疆佛寺、石窟、遗址壁画的供养人形象、敦煌莫高窟佛传故事中出现较多,一般认为是回鹘族男性所独有的民族服饰,其主要特征是冠顶上竖立三个柱状物。花根塔拉辽墓中出现的这种三叉冠,显然对佩戴者的性别和身份没有标识作用,有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可能是萨满,而三叉冠则代表了萨满作法时的法器。

赏石



鸿运当头

□臧敖

这是一枚巴林石“花生糕”冻石方章(如图),是巴林石中的精品。

巴林石隶属叶腊石,主要产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西北、雅玛吐山北面的大小化石山一带,与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并称为“中国四大印石”。其石质细

润,通灵清亮,质地细腻,光彩灿烂,颜色妩媚温柔,似婴儿之肌肤,娇嫩无比。赤峰收藏家协会会长、龙乡博物馆馆长臧洪贵收藏的这枚巴林石方章,通体遍布着密密匝匝的花生瓣,好似桃汁拌着花生做成的花生糕,因其上端的红色部分又似陈年红葡萄酒,藏友们戏称其“鸿运当头”。

瓷器

□陈炎青

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其瓷器外销最为兴盛的时期。明清景德镇外销瓷,在带来经济交流繁荣的同时,也促进着文化交流与交融。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审美观念,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通过瓷器这个载体,在交流与互动中绽放异彩。

清代仕女画面的瓷器在外销瓷中十分常见,如仕女撑伞、仕女梳妆、仕女观斗鸡、仕女采桑、仕女放风筝等,足见当时欧洲人对仕女题材瓷器的喜爱。本文所要介绍的这件清乾隆青花矾红描金撑伞仕女纹盘,源自考纳利·普朗克画作,盘外壁绘有青花昆虫。此盘直径23.5厘米,高2.5厘米,足径13.5厘米。盘面纹饰以青花矾红描金等技法并用绘制图案,制作精美,华贵典雅,光彩照人。盘面图案布局合理,共分三层:盘中心为撑伞仕女图,阳光下,池塘畔,水草茂盛,鲜花绽放,离鸟欢跃,一衣着华丽的女主人仁立欣赏美景,身后一侍女为其撑伞遮阳;第二层以一周折枝花草装饰;盘沿部分则以矾红描绘锦地,留出8处开光,开光内绘有仕女、飞禽等两两对称的边饰。盘背面还有不常见的青花昆虫纹饰。这



清乾隆青花矾红描金撑伞仕女纹盘。

类图案的瓷盘是外销瓷中的佳作,颇受海外欢迎,外国许多博物馆中也有展示,并被列为“特别订制”瓷盘。不少外销瓷书刊均有记载,拍卖会上价格不低,很为藏家追捧。

考纳利·普朗克是荷兰画家和设计师,他于1734—1740年间受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为定制瓷器设计纹样。他所设计的纹样据说有4种,但只有“花伞”系列和“博士”(或称“学者”)系列留下了纸本样稿或订单,因此其

撑伞仕女纹盘

他系列——“凉亭”和“仿中国花鸟人物”系列已无从考证。他设计的纹样被送到中国后,在景德镇烧制成青花和粉彩瓷器,然后运到广州出口外销。在18世纪70年代,这种盘子的订单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生产质量低下,很多盘子的外壁已经没有昆虫纹饰。

这件撑伞仕女瓷盘是外销瓷发展历史的见证,给我们许多启示:1、外销瓷作为中国瓷器产品的一个特殊品种,因为主要用于外销,国内收藏中极其少见,其装饰特点也十分独特,大量中西结合的纹饰以及纯西方题材的装饰出现在这些瓷器产品上,是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具像品;2、外销瓷中西结合的风格逐渐演变为外销瓷烧制的中西合作模式:景德镇依据外商要求的器型烧制素瓷,运至广州后,由中国画工依据西方人的要求装饰他们喜爱的色彩、纹样,同时配以一些中国风格的纹饰,使中国风情和异域特色在外销瓷上完美结合在一起,更有部分中国烧制的素瓷被运到欧洲后由西方人进行彩绘装饰,西方彩绘师把西方人的喜好和想象在中国瓷器上直接表达出来;3、明清外销瓷作为贸易品,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将西方人带到传说中遥远的东方。明清外销瓷装饰图像的题材丰富多彩,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讲述着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心路历程。